爱国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的对立

——《近代爱国主义论纲》前言

李文海　张晓虎

有的文章把爱国主义称做是“常青的主题”，这话很有点道理。几千年来，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从来就是推动祖国社会历史前进的一种巨大力量。在漫长的奴隶制时代和封建社会，我国各族人民，就在爱国精神的鼓舞下，顽强地同黑暗的专制统治、同国家分裂和民族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并通过辛勤的劳动，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到了近代社会，随着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加深，愈来愈多的人将鲜血和生命无私地奉献给争取祖国独立和民族生存的爱国事业，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历史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之后，“振兴中华”的口号，依然成为激励人们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争取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战斗号角。未来如何呢？太远了不敢说，至少，在国家消亡以前（这也是一个不短的历史时期了），人们以真挚的感情热爱这“生于斯，长于斯，衣食于斯”的祖国，并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祖国的进步和昌盛作出贡献，无论如何总是一种值得称颂的高尚情操。

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爱国主义。前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时侯，就有那么几个人，公开表示了对于爱国主义的轻蔑。有的说：“如果要我彻底说，我不赞成爱国主义的口号，至少不是完全赞成。”还有的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肖子孙，且以此为荣。”还说：“决不能蛮不讲理或愚昧无知地要求一个人去爱把他变成非人的祖国。难道一个把所有人都变成奴隶、变成零的国家还有什么值得留恋吗？”

在进一步讨论这些看法之前，我们想先加进一个小小的插曲：前面引的第三句话，显然是把国家和政府两个不同的概念相混了。试想，“祖国”怎么能够把人“变成非人”、“变成奴隶、变成零”呢？按作者的原意，显然是在那里指责政府，至于这种指责同客观事实背离有多远，任何一个稍为公正一点的人都能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问题是，早在清朝末年，一些较为进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就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要谈爱国与救亡，“必自辨朝廷与国家之区别始”，如果连政府与国家的区别都弄不清楚，也就根本失去了谈论爱国与否的资格。本来，象这类小小的常识性错误，大可存心忠厚一点，不必深究的。但他们这些人，一开口就以“启蒙者”自居，摆出一付“唯我独醒”的架势，似乎别人全是“愚昧”得一塌胡涂，只有他们才是真理的化身。既然这样，我们也就偏要让人们见识见识，他们的某些看法，怎样落后于将近一个世纪之前的一些人的水平。如果读者有耐心将本书读完，就不难发现，这些自许为学术“精英”和政治“精英”们的识见，其水准大大低于清末思想界的状况，决不止于这里提到的个别例证。

现在再把问题拉回来：他们为什么那样不喜欢、不赞成爱国主义呢？这自然是因为我们的祖国“实在是太不可爱了”的缘故。确实，他们曾经用了许多笔墨，来形容我们祖国和民族的“丑陋”：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是一堆糟粕和垃圾，“早就该后继无人”，加以“整体地打破”和“全面否定”；这种“千年不死的劣根”的文化，根本就没有同西方文明“对抗”的

资格，只能老老实实地“承认落伍和失败”；“中国可能有很多文化都要淘汰掉，彻底淹没”，对此“不需要太介意”，即使“面临彻底的完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由于“旧文明的沉渣已经像淤积在黄河河道里的泥沙一样，积淀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人民思想文化非常非常落后”，所以，我们的“民族正在自戕”，出现了“人的退化，民族的退化”；充满“奴性”，缺乏创造力，安于现状，畏怯斗争，逃避现实，“成为整个民族的人格”；他们在强调“我们这个民族的弱点”的时候，“甚至感到与人种不无关系”，就是说，不但我们的民族是劣等的，而且连“人种”也不行。自然，由这样的一些人民组成的国家，必然“让人们看不到希望，看不到人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所以，他们说，“中国是个没有个性的国家”，“中国是个处处有特权的不平等的专制国家，它所提供的条件，最容易发挥人性的弱点，可以把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中被抑止的人性弱点重新复活，发扬光大”；中国“社会进入了全面的危机”；“我们现在是全面的落后状态，中国现在没有一样不落后”。总之，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华民族仍然举步维艰。举目四望，贫穷遍地，愚昧横行，豺狼当道，精英毁弃，独裁专制，无民主、自由立锥之地！”

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可憎”、“可恨”之不暇，哪里还“爱”得起来呢？难怪他们当中的一位如此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这样的国家为什么非要爱她不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反对爱国主义，必然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或者反过来说，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正是同爱国主义根本对立的。

其实，前面所引的那些话，都只不过是一种烘托，一种铺垫，目的是引出最最重要的一个政治结论，那就是：中国任何别的出路都已经没有了，唯一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全盘西化”；或者象方励之在回答“中国的出路是什么”的提问时更坦率地所说的：“资本主义化！”

“全盘西化”这种主张，几十年以前就有人提出过了。但似乎谁也没有“化”个样子出来让人瞧瞧，因为谁也无法做到这一点。那末，“资本主义化”是不是那么美妙呢？

诚然，资本主义制度也曾有过其先进和进步的历史时期，这就像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后的早期历史作用一样，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领导并代表着进步的历史潮流。但“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其私有制的内核注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所标榜的“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都将成为剥削压迫本质的妆饰物。一掷万金的豪富与颠沛求食的平民坐在一起谈“人权、平等”，岂不是滑稽得很么？而且，稍翻看资本主义发迹史，倘不是昧着良心说瞎话，谁都会承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现今世界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是将资本主义的天堂构筑在各世界各殖民地几代人民的血汗和尸骨之上。那么，中国如果也去“资本主义化”，是否也要用炮舰加鸦片去扩张殖民市场呢？是否也要在一番杀伐流血（资本的早期积累阶段）之后，去形成几大经济财团并由这些经济财团为后盾扶植起政治上的党派体系、从而造成几党抗衡的“民主政体”呢？是否更要为达此目的而骂倒祖宗、否定一切传统文化呢？

“全盘西化”也好，“资本主义化”也好，似乎都过于空泛，我们倒不如看看他们在不同场合开出的几付具体药方。这些药方，最有趣的有这样三条：一是中国“不是要解放，而是要解散、解体”；一是中国要再当“三百年殖民地”；再有一条是中国应该“引进一个外国总理”。这些主张，现在看起来似乎如同儿戏，不妨一笑置之，但在当时，却是郑重其事地作为解决中国往何处去的严肃政治问题提出来的，所以也还是值得对此说几句。

"解散"和"解体"论的发明者，现在是已经实践了自己的意愿，到海外当"世界公民"去了。这自然对谁来说都无关紧要。但中国如果真的"解散"或"解体"之后，十一亿多的人民，一齐跑到外国去当"世界公民"，不知有哪个或哪几个国家能够"收容"得起？如果说，这十一亿多已被"解散"了的芸芸众生，并不跑到海外，依然只准熙熙攘攘地生活在业已"解体"了的无政府的中国这个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特定环境之中，难道他们真的就从此"得救"，即刻就获得完满的自由、民主和幸福了么？恐怕谁也不会相信这样的神话。

再当"三百年殖民地"，开出这张药方的人，大概是以为，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彻底的"全盘西化"。那末反过来，真正实现"全盘西化"，也就不过是成为殖民地罢了。就这个意义说，我们和他们的看法似乎没有什么分歧，用句时髦的话说，大家存在着一种"共识"。所不同的，只是他们认为成为殖民地之后，"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可以告别"在封闭中的衰败"而走向"繁荣"；而我们则根据中国以及世界上一些地方曾经有过的历史经验，确切知道这不过是意味着广大人民群众将再一次成为任人宰割、掠夺、凌辱的奴隶而已。

至于"引进一个外国总理"，中国历史上倒还没有这样的先例。但引进一个外国人来当掌握海关大权亦即掌握国家大门钥匙的总税务司，引进一个外国人来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外交使团的团长之类的事，是早已有过的。这都发生在清朝末年的近代历史上，离我们现在并不那么遥远。而且那个时候，作为中央政权的朝廷，整个说来都要俯首听命于洋主子，因而被当时的人们称作是"洋人的朝廷"，论理说，实在比仅仅引进一个外国总理还要彻底得多。效果如何，那是一部中国近代史早已回答了的，根本没有必要再在这里浪费笔墨的了。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道不同不相为谋"。同他们一本正经去讲这些道理，即使不被人讥为"对牛弹琴"，起码也是迂得有点滑稽可笑。鲁迅说过，"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法子"，那末，我们还是不要一味争论此是彼非，倒不如把他们那些高论，同历史事实来作一点对比吧！看看我们的先辈们在国家民族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用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去回答时代提出的挑战，再看看那些"精英"们前几年的言与行，从这种对比中，人们一定能够公正地作出判断，哪些是真的、善的、美的，哪些是假的、恶的、丑的，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这就是我们写这本书的缘由。

我们选取的作为研究对象的时代，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的近代史。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内，有关爱国主义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尽量地进行分析性的探究和评论。肯定地说，书中的许多具体看法并非十分成熟完善，但我们力图忠实于历史，决不为着某种主观意愿而对历史实际进行随心所欲的拚凑剪裁。我们所以把这一历史时期作为研究的范围，是因为这八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危机最为深重，同时也是爱国主义最为昂扬的时代。在这个时期内，没有一个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历史运动，没有一个对祖国命运起过进步作用的历史人物，不是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活跃于历史舞台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历史航船几度濒危，但这航船历经风雨而终未沉没，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这航船上始终飘扬着一面任何敌人都无法摧毁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那历久弥新的爱国主义精神！近代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国魂"和"民魂"。

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在被反动派囚于狱中、年轻的生命即将结束之前，曾写下"一瞑负多疚，长歌抬国魂"的诗句；另一位同时代的革命家赵声，则在诗中

高歌"大好头颅拚一抛，太空追攫国民魂。"他们都不仅用语言和文字，而且用鲜血和生命去讴歌、去实践、去追求充满爱国精神与革命精神的"国魂"与"民魂"。鲁迅先生则说得更加清楚："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又说："惟有民魂是很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近代社会有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下不断沉沦的一面，也有人民不断觉醒不断斗争从而使社会不断前进的一面。正由于爱国主义的"国魂"和"民魂"的发扬，才最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才有了今天独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社会主义中国。

让我们对那些魂系中华、情系中华的先辈们表示至深的敬意！

（《近代爱国主义论纲》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接51页）

东和华北各地推进。许多论述，极为细致和广泛，为一般论著所不及。如晤修和尚为首的义和拳在景州一带的斗争；王庆一为首的义和拳在枣强、景州、故城地区的活动；义和拳在吴桥、德州的战斗；1900年1月阎书芹为首的义和拳在冠、邱十八村一带的活动；义和拳的均粮斗争；1900年7月义和拳攻打临清小芦教堂、威县魏村和赵家庄教堂、武城十二里庄教堂以及义和拳在梨园屯与官军的战斗情况等；该书都真实地再现出来，使读者较全面地了解义和拳在直隶、山东交界一带的发展概貌，从而推进对义和团运动整体的探研。学术专著，贵在深入和创新。《起源》在这方面独具风姿。

二是提出了不少新见解，解决了一些义和团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休的疑难问题。例如义和团前身主要是何组织，各种说法纷纭不一。《起源》一书则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和团运动是义和拳运动的延续和发展。路遥教授认为，大刀会的刀枪不入与神拳的降神附体，虽然给后来的义和团运动提供了组织的典型仪式，但就这场运动发生、发展的全过程来看，义和拳乃是最重要的一支。长期活动在山东、直隶交界地区的义和拳不仅为义和团运动提供了名号、组织方式和斗争目标，而且有自己特有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有流行较广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拳术和大批会众。无论是山东或是直隶的官员，都曾企图把它变成合法的民团组织，"义和团"之名就是由山东地方官员针对这一地区的"义和拳"首先提出的。后来的义和团运动虽是大刀会、红拳、神拳、梅花拳、义和拳等众拳会的汇合，但义和拳则贯穿于这一运动的始终，占主导地位。这种看法，受到中外许多专家学者的赞赏。值得称道的是，《起源》一书还进一步提出了义和拳源于离卦教和梅花拳的新观点，大致解决了义和团的源流问题。路遥教授通过长期的跟踪调查，先是发现了了"老阎团"；随后又从民俗、信仰的角度深入考察，梅花拳的"文场"组织；进而又从私藏家谱中发现发现直隶、山东交界的民间秘密组织的八卦思维；同时又调查到沙柳寨的赵三多首先将"梅花拳"更名为"义和拳"。将这些新发现，印证史料，再上升到理性，终于有理有据地澄清了义和团的源流。类似这样的富有学术创新的新观点，《起源》一书还有，这里从略。

总之，在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起源》具有开拓意义。